让党的旗帜在党校高高飘扬

以“不一般”的力度 建“不一般”的队伍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校事业发展纪实（五）

□ 冯秋婷 谢煜桐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12月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指出：“在党校所有财富中，教师和其他各类人才是最宝贵的财富；在党校所有资源中，优秀教师和优秀人才是最急需的资源。”总书记指出：“党校不是一般学校，党校教育培训对象不是一般学生，这样的‘不一般’对党校师资的要求也不一般，党校师资队伍建设力度也应该不一般。”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党校系统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坚持人才强校战略，以师资队伍建设为重点，大力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为党校事业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持和组织保障。

坚持党校教师姓党

党校教师素质千条万条，政治素质是第一条。对于党校教师来说，首先要做到自觉坚持党校姓党、党校教师姓党，时刻牢记自己党校教师身份，热爱党、热爱党校，坚持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执着和坚守，坚持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时刻与党中央保持思想上政治上和行动上的高度一致。

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要求党校、干部学院、社会科学院、高校、理论学习中心组等要“成为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宣传的重要阵地”后不久，北京市委党校就以校委会名义下发了《关于在全校教研人员中开展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加强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精神的意见》，并从2014年1月开始，开展了为期半年的关于意识形态领域问题的系列研讨活动，研讨活动对坚定党校教师姓党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2015年3月，重庆市委党校《意识形态责任书》签字仪式举行。市委党校全体教师在责任书上签署了他们向党看齐、为党护旗的庄严承诺。校委明确提出，党校姓党，就必然要求党校教师先姓党；要培养“四铁”干部，就必然要求党校教师先成为“四铁”教师。

2015年4月，甘肃省委党校结合“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启动了“守纪律、讲规矩”主题教育活动，把“守纪律、讲规矩”贯穿到教学、培训、科研和管理的全过程。发放680份《省委党校工作人员遵纪守规测评表》，对任课教师、班主任等遵守和执行纪律情况进行测评，促进党校工作人员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促进教风、学风、作风更清更正。

2015年9月初至10月底，宁夏自治区党委党校在全校组织开展了主题为“党校姓党、对党忠诚”大讨论活动。通过大讨论，大家对为什么要坚持“党校姓党、对党忠诚”有了新的认识，对如何做到党校姓党、对党忠诚有了更为准确的把握。

多管齐下解决“倒挂”问题

中央党校历史上涌现出许多名师、大家，像艾思奇、杨献珍、郭大力、范文澜、范若愚、胡绳等。他们是党校的光荣，也为后来的党校人树立了标杆。经过多年培养和积累，全国党校目前已经拥有一支素质较好的师资队伍，其中也有在国内外享有较高声誉的名师名家，但与党校事业发展的要求相比，新时期党校师资队伍整体素质还迫切需要有一个大的提升。

党校师资队伍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倒挂”现象。不少教师学科背景和知识结构比较单一、工作阅历比较简单。有人评论这种现象时说：没做过领导的在给领导干部讲领导艺术，没出过国的在给经常出国的人讲国外经验，没经历复杂环境考验的在帮助每天与各类矛盾打交道的人出主意解难题。在师生的“教”与“学”的关系上，出现了“倒挂”。这种状况亟待改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党校通过优秀教师传帮带、挂职锻炼、蹲点调研、教学科研实践、访学深造、外向型培训等方式，着力提高现有教研人员的政治素养、专业水平、科研能力。

2014年，为进一步实施人才强校战略，鼓励和推动教学科研人才在工作上不断进取和拔尖，充分发挥著名专家学者在教学科研工作中的带头和示范作用，中央党校校委决定启动校专业技术内设一级岗位聘用工作。7月，首次聘用工作完成，韩庆祥等六位教授聘任到专业技术内设一级岗位，聘期3年。

2015年7月，中央党校第四批挂职锻炼教师赴浙江台州报到。挂职锻炼一直是中央党校教师队伍建设，特别是中青年骨干教师培养的重要举措。2011年，在时任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同志亲切关怀下，中央党校在浙江省建立了教师挂职锻炼基地。这样的挂职锻炼基地还有福建、贵州。从2011年底至2015年底，共有51名干部先后在这些地方完成了为期1年的挂职锻炼。

开展专题培训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形式。2014年4月、2015年3月、2016年4月，连续三年分别围绕“如何讲好一堂课”“研讨式教学”“提高中青年教师开展‘2+0.5’互动教学能力和水平”，举办了中央党校青年教师培训班，共有128名来自各教研部（院）的中青年教师参加了培训学习。除了校内培训，出国访学、人才强校资助、课题申报等也都向年轻教师倾斜，这些举措有效增强了师资队伍的能力和水平。

在坚持党校教师姓党、严格要求严格管理教师队伍的同时，中央党校校委也从工资待遇等多个方面着力改善教师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努力使广大教师既能够体面地工作，也能够体面地生活。

一项项队伍建设举措，促进了中央党校教师茁壮成长，让教研人员感到有尊严、有盼头、有奔头。

地方党校也采取强有力举措解决“倒挂”问题。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党校为提高青年教师素质，推行“新教学法”，包括结构化研讨、案例教学、现场教学、行动学习法、组合式教学等。新教学法有利于实现“教学相长、学学相长”，使得青年教师得到很大的锻炼、提升。

青海省委党校把人才强校作为党校办学的支柱和保障，先后出台《校院“十二五”时期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等8份指导性意见，努力做好教师队伍建设工作。目前已经形成了1个省级人才小高地、2个校级人才小高地、6个重点项目团队，教师队伍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党校重点实施了3项人才工程，即：教师和干部全员培训工程，第一轮5年培训计划顺利完成；“225”人才建设工程，用5年时间培养20名教授、20名博士、50名中青年学术骨干的任务基本完成；全疆党校系统百名骨干教师培养工程。

青岛市委党校开发了“一人一策”成长计划，为每位教师建立涵盖教学、科研、获奖、培训等不同内容的个人发展档案，有的放矢地制定培养方案，达到扩大优势、补齐短板，促进教师个性化发展。

2014年春，长春市委党校推出了“长春通”人才培养工程。有10名青年教师被确定为“长春通”人才，党校聘任了10名正局级领导干部，成为这批“长春通”人才的导师。导师对这些教师进行“一对一”的指导，支持他们针对长春市各个领域进行调研。

行政后勤等人才队伍建设齐发力

党校的行政后勤等人才队伍是党校队伍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校各项工作高效运转的重要力量，这些队伍建设必须与教师队伍建设一齐发力，同步推进。

2015年，中央党校共选派130多人次参加各级各类干部培训。2016年3月11日上午，为贯彻落实全国党校工作会议关于从严治校和中央纪委对干部早教育早提醒的要求，中央纪委驻中央组织部纪检组会同校组织部、校机关党委和纪委召开新提任局级干部集体廉政谈话会，对新提任局级干部提出明确要求。

党校的未来属于青年。2015年11月，中央党校组织部和机关党委共同举办青年干部培训班。此次培训班以“加强党性修养、提高履职尽责能力”为主题，为期五天。共有40余名党校新入职人员参加培训。

为加强行政干部队伍建设，三年来，吉林省委党校多次选派处级干部及其他参公干部参加校内主体班和短期班专题培训班学习，组织校内各部门支部书记参加“重走抗联路”党性教育累计200人次。抓住重大节点任务，把承担重要工作作为提升党校行政管理队伍能力和水平的重要平台，特别是筹备全省党校工作会议的4个多月时间里，通过起草各类重要文件、会议材料及会务筹备工作，使得行政干部积累了承办大型会议的经验，提升了政策和文字综合能力。

南京市委党校一直高度重视行政干部队伍建设，为了给德才兼备的人压担子，给实绩突出的人搭台子，结合新党校建设需要，市委党校实行了中层干部竞争上岗、管理人员轮岗交流工作。

搭建制度保障平台

为了推进队伍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党校不断健全和完善制度举措。

无论多么宏伟的目标、多么明确的任务、多么有效的措施，最终都需要现实中的人去实现、执行和操作。如果没有良好的机制和正确的导向，就无法有效动员广大教职员工投身于中。正是出于对上述问题的清醒认识，安徽省委党校校委形成了三份具有关键意义的考核办法，包括《中共安徽省委党校专业技术人员岗位业绩量化考核暂行办法（修订）》《中共安徽省委党校事业管理和工勤人员岗位业绩考核暂行办法》以及《中共安徽省委党校行政后勤和教辅部门工作考核暂行办法》。考核办法的核心原则就是“优胜劣汰、奖勤罚懒”。奖是真奖：晋级、评优、绩效工资额度确定、获得培训机会等全凭分值决定；惩是真惩：总成绩在考核办法规定的最低要求以下，最严厉的惩罚是岗位薪级下调。

广东省委党校相继出台《校（院）行政部门处级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办法》《校（院）教研教辅部门领导干部选聘工作办法》《关于选派青年教师和行政干部到挂职基地锻炼的实施办法》《校（院）岭南学者岗位计划实施办法（试行）》等制度规定。2014年，全面实施绩效工资改革，工作业绩考核和薪酬挂钩。2015年，进一步创新管理机制，建立完善了干部选拔、人才培养、绩效工资、岗位评聘、工作考核等制度规定。在制度的促动和保障下，广东省委党校一批又一批博士、专家、学科带头人在党校的教坛和学术氛围中实现了发展的突破。

陕西省委党校提出了“打造名校、造就名师、培养名生”的人才强校工程，出台了《人才队伍建设规划2016—2020》《高层次科研成果随时奖励办法》和《事业岗位规范管理办法》，着力制定完善教职工培训机制、创新考核评价机制、绩效分配办法，严格规范管理，不断激发人才队伍内在活力。

（上接1版）

长征途中，红军部队官兵一致、上下平等。周恩来把自己的担架让出来，让受伤的机要参谋坐，彭德怀把自己身上的粮食倒出一半来，分给军团教导队长——这些都生动地体现了民主、平等的革命精神。长征中，团以上干部才配有马，但多数都让给了伤员和掉队的战士骑。同样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医护人员为照顾伤病员和体弱的战友，把自己保存的一点青稞面让给他们，自己却用野菜、草根充饥。官兵中一人晕倒了，几个人抢上去扶持，许多同志为了救援别人，自己陷入了泥潭之中，牺牲了生命。红军过草地时严重缺粮，为了弄清挖来的野菜是否有毒，一个连队召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党小组会，党员们争着先尝野菜，最后不得不进行举手表决。在党员干部的带动下，部队更加团结，红三军团某连有九名炊事员相继牺牲，而这个连没有一个战士因饥饿而死。部队在长征中损失巨大，不断整编、压缩、合并、撤销，干部层层下放，各级指挥员都以大局为重，能上能下。

在长征中，正是有了党的坚强领导，红军广大指战员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毫不动摇地保持着革命必胜的信念，以惊人的智慧和毅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重兵追堵，克服雪山草地的艰险，经受饥寒伤病的折磨，战胜党内分裂的危机，胜利地完成了长征，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民主和集体决策——红军战胜艰难险阻、取得胜利的关键之举

长征中，红军处境险恶，危机重重。“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怎样使党和红军化险为夷？怎样保证党的正确领导？怎样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怎样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这些重大问题都需要一个答案，那就是充分发扬民主，实行集体决策。

历史充分证明，没有民主和集体决策，红军就处于险境。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居于党内领导地位期间，红军的民主传统遭到了严重破坏，广大红军指战员只能机械地执行中央决策，否则就会遭到斗争和打击，致使中央红军遭受重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遵义会议后，中央领导集体重新恢复了红军的民主传统，从而使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创造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参与围堵的敌军虽有数十万之众，红军却能进退自如。

长征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一次远征。在长征过程中，红军要面临数倍于自己的敌人，武器、装备、补给匮乏严重缺乏。在这种情况下，军队顾全大局、团结一致成为关系到党和红军生死存亡、革命事业兴衰成败的大问题。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正如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评价的那样，它“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后，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指出：“党内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的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

每当遇有重大军事行动和战略方针问题，中共中央都及时召开相关会议集体讨论决定，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有效地保证了决策的科学性。湘江战役后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实现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方向的初步调整；扎西会议的召开，彻底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者在中共中央长达4年的统治，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从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政治局常委会，到扎西会议，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遵义会议”。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并坚持了北上战略方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及时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制定了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总政策，为迎接抗日时期的到来做了政治上的准备。

在长征中，中共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有史可存的有30多次，各路红军召开的重要会议有数十次之多。不仅如此，毛泽东经常要求各级指挥员召开各种形式的“诸葛亮会”，征求各级指挥员甚至普通战士的意见。陈毅回忆说：红军时期的民主，“不管你是哪一个领导，也可以给你框几个缺点”。

一切服从中国革命大局——团结出凝聚力，团结出战斗力

长征中，红军具有高度的全局观念和自我牺牲精神。在困难和危险的时刻，许多部队为了全局，自愿作出局部的牺牲。红六军团西征，为中央红军长征争取了时间，探明了道路。红二、红六军团转战湘西，红四方面军举行嘉陵江战役，与中央红军转战云贵川互相呼应，使国民党军疲于奔命。

从1934年11月29日到12月1日凌晨，中央红军血战湘江，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第34师、红三军团第6师第18团及红八军团的部分兵力为了掩护主力红军及中央纵队力过江，被国民党军队阻隔在湘江东岸，大部壮烈牺牲。

中共中央把各路红军的团结作为一项重要的纪律，团结出凝聚力，团结出战斗力。开始，长征是从各个根据地先后出发，相对独立进行的。由于历史的原因，各个根据地红军部队的作风习惯等不尽相同，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着共同的政治基础和革命目标，各路红军实行了密切的战略协同和配合，使国民党军顾此失彼，分散了敌人的兵力。

1936年6月18日，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今小金）地区，与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宣告了蒋介石分割各路红军，各个消灭的计划的破产。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集结在这个地区的红军兵力达到10多万人，其中红一方面军3万多人，红四方面军8万多人，实力大大增强，当务之急是明确主攻方向，确定战略方针。有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形势是比较有利的。然而此时，张国焘竟将实力较强的红四方面军视为自己向中央伸手要权的资本。出于对全局的把握和对敌情及川西地区人口、地理、经济、民族情况的分析，党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放弃原定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提出了北上川陕甘的方针。但是围绕战略方针，党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和争论。

中共中央和张国焘之间在战略方针上的分歧，是关系到党、红军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的重大原则问题。党中央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坚持北上，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胜利地完成了长征。

三支主力红军会合后，红军虽然只剩下几万人，但这些经过千锤百炼后保存下来的力量，是党和红军的极为宝贵的精华，成为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骨干。

严守群众纪律——赢得各族人民的信任、拥护和支持

红军长征曾经过西南、西北大片少数民族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了正确的民族政策，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为基本原则，以尊重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民族文化为主要内容，以建立互相帮助、共同进步为主要奋斗目标。

红军北上进入大凉山彝族聚居地区时，毛泽东嘱咐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先遣队的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只要我们全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党的民族政策，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彝民不会打我们，还会帮助我们通过彝族区，抢渡大渡河。

刘伯承坚定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与彝族沽基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盟修好，并使其他部落保持中立，顺利地通过彝族地区。

红军长征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都大力宣传和认真执行党的宗教政策。中国共产党主张各少数民族有宗教信仰自由，“准许人民信仰菩萨，不愿当喇嘛的允许还俗”。明确宣布：不准擅自进驻喇嘛庙，不准撕毁藏民贴在门上的封门“神符”，不得擅入清真寺，不得损坏回民经典，部队在回民地区不得吃猪肉，等等。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部进入西康甘孜藏区时，曾以“中国抗日红军先遣军”名义发布布告：“此系合则觉母寺院，凡一切人等不得侵扰，此告！”红四方面军对甘孜附近的白利喇嘛寺也发布了保护文告：“查白利喇嘛寺联合红军，共同兴番灭蒋，应予保护，任何部队不得侵扰，违者严办，切切此布！”

1936年3月初，朱德率领红四方面军到达甘孜地区，也就是如今的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五世格达活佛通过对红军的亲自观察，以及与朱德的九次促膝长谈，对红军有了新的认识，从而澄清了此前流传的有关污蔑红军的言论，他还积极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五世格达活佛亲自出面做工作。在朱德的带领和藏族同胞的支持下，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经过几个月的共同努力，不仅解决了自己需要的大部分御寒装备，还给即将到来的红二、红六军团的战友们解决了御寒衣物。

红军之所以是红军，就是执行了自觉严格（甚至严酷）的群众纪律。过草地，部队筹集到数量有限的青稞麦，炒熟后压成了粉子准备过草地用。进入草地后，部队在艰难地穿行，维持生命的粉子却在一天天地减少。为使部队渡过难关，甘泗淇召集政治部的同志开会研究，作出三点规定：一、各连首长要亲自给部队发粉子；二、每人每顿只准吃一把粉子；三、不到开饭时间不准吃粉子。还特别要求政工干部要起模范带头作用。此时，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十七团一个连政治指导员在给全连分发粉子时，自己悄悄地多拿了一把。此事反映到军团政治部。为了严明纪律，该指导员被撤职，甘泗淇签发了处分决定。时任师政委廖汉生回忆说：“这样的处分在今天的环境中看来，也许过于严厉了，但是在当时那样艰苦的时刻，作为一个政治工作干部、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参加红军多年的老战士，他只有带领同志们向饥饿作斗争的责任，绝没有为个人谋半点私利的权力。”

依靠这些铁的纪律，才让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赢得了群众的信任、拥护和支持。各民族群众十分钦佩红军严明的纪律和平等的民族政策，他们纷纷要求参加红军队伍。据不完全统计，少数民族参加红军的，贵州有1.25万人，四川有5.5万人，甘肃陇南有2000多人，云南扎西有3000多人。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红军才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个新的胜利。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严”字当头，加强党的建设，这是长征胜利的关键所在。这也是我们弘扬长征精神的要旨所在。弘扬长征精神，不仅是培养一代代共产党人党性修养的重要载体，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要求。